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

辛红娟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B223.15/11

2008

译学新论

张柏然 许 钧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

辛红娟 著

本书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基金、
湖南省翻译研究基地经费
资助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辛红娟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978-7-5327-4381-0

I. 道… II. 辛… III. ①道家②老子-研究
IV. 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433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

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

辛红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24,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250 册

ISBN 978-7-5327-4381-0/H·795

定价:2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401196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7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总
序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老子其人及《道德经》其书	/3
第二节	跨越时空的行旅:《道德经》的流传及影响	/9
第三节	《道德经》英译研究的理论框架及意义	/30
第二章	时空徙移:文本行旅与翻译变异	/49
第一节	翻译的变异与时空迁移	/52
第二节	旅行概念厘定及其文化特质	/63
第三节	旅行与文学翻译的象似性	/81
第四节	旅行研究的文化转向	/97
第三章	理解《道德经》:哲性文本的诗意存在	/113
第一节	文本理解——翻译实践的起点	/116
第二节	《道德经》多元理解的语言学分析	/122
第三节	《道德经》的诗性言说方式	/133
第四节	《道德经》文本的“隐而空”	/144
第四章	接受与阐释:《道德经》英译文本的多元存在	/159
第一节	文学接受与《道德经》的召唤结构	/161
第二节	《道德经》在西方的历时接受	/182
第三节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文本形态	/200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	目的与操纵:《道德经》文本的主要翻译策略	/ 221
第一节	翻译的文化责任与目的	/ 224
第二节	外围策略与《道德经》的接受	/ 245
第三节	内部策略:译者对《道德经》的语言操纵	/ 267
第六章	想像与变形:《道德经》在英语世界	/ 311
第一节	想像的投射与形象建构	/ 314
第二节	英语世界的《道德经》文体形象	/ 333
第三节	英语世界的《道德经》圣人形象	/ 350
第四节	英语世界的“道体”形象	/ 363
第七章	结论	/ 379
第一节	文化旅行之于文学翻译	/ 381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与修辞接受	/ 383
第三节	本研究的意义及拓展空间	/ 387
	参考文献	/ 392
	后记	/ 410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老子其人及《道德经》其书

关于老子的生平,《左传》、《礼记》、《孔子家谱》、《庄子》、《列子》诸书中都有记载,但比较详细而可靠的论述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传》^①: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其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修书上

^① 对司马迁的记载,从汉至魏晋无人怀疑。据说北魏崔浩是第一个怀疑司马迁关于老子生平说法的人,不过没什么影响。由宋至清怀疑者渐多,而20世纪初,以梁启超和胡适为首的两派曾展开过激烈的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论战,论战文字达50多万。陈荣捷的英译本《老子之道》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历时最长、牵涉面最广的一次学术论战。目前,关于老子生平及《道德经》作者,学界基本采信司马迁《史记》中的这一说法。

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①

由是，我们知道，老子是春秋时楚国（今河南省鹿邑县厉乡沟）人。应关令尹喜之求，作五千文字，称《老子》，分上下两篇^②。公元二世纪，汉代皇帝倚重该书作为治国之术，赐以经书的神圣地位，自此，《老子》始称《道德经》或《德道经》^③。《道德经》共 81 章，前 37 章为卷上，后 44 章为卷下（有的版本卷上题为《道经》，卷下题为《德经》）。全书围绕“道”这一哲学概念，阐述了世界万物的起源、存在方式、运动发展规律、社会矛盾与解决方法等。

老子主张以静观玄览的方法认知世界，“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道德经》第四十七章）^④老子养生论的主要观点是寡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第十二章）“玄同”是老子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第五十六章）则是老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形态。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和谐状态，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章）

《老子》凡五千余言，引导人们突破眼前狭小空间的限制，把思维拓展到广袤的宇宙，启示人们自由地去探索未知世界，包括了养生论、人生论、政治论、军事论、认识论乃至人生哲学、自然哲学、宇宙哲学等深广的内

① 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701—1702 页。

② 刘殿爵说，这一分法始自公元一世纪，很可能只是为了与《史记》中“修书上下篇”的记载一致而已。参见 Lau, D. C. *Tao Te Ching*.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3. p. 7.

③ 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一批帛书。其中帛书《老子》甲、乙本尤为引人注目，因《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故有此称。

④ 文中所引《道德经》原文，若非特别指明，均出自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容,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即便在儒家学说占据正统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老子学说中的政治论、军事论也备受统治阶层的关注,九五之尊的君王从中借鉴人君面南之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老子反对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但他对用兵之谋自有一套言论,“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道德经》第六十九章)

《道德经》书中 37 章论道,“道”这个字前后共出现了 73 次(有说 74 次)^①,这些“道”字,符号形式虽然一样,但其意义内容却不尽相同^②。通观全书,我们发现,作为《道德经》中心范畴与基石的“道”,其基本意义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形而上的实存者”;“一种规律”;“人生的一种准则、指标或典范”。^③老子之“道”涵盖了由现实生活到宇宙本原的各个层面的哲学思考。“道”飘忽不定、无法体认,连老子本人也无法给出确切的定义,文章一开始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作为核心和基石的“道”是由人生论、社会论、政治论而至本体论的

①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认为“道”这个字,在《老子》中前后出现了 73 次;王岳川《道德经》(大师经典文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年)“序言”认为,《道德经》81 章中有 37 章论“道”,“道”字共出现 74 次,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德”字出现的次数,也存在着不同说法,这种统计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依据的版本不同造成的。

② 根据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辞源》3073 页,“道”的基本含义有:道路;方法、技艺;规律、事理;思想、学说;说;道象之简称;祭路神;疏通;引导。陆沉在“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之异同”一文中说,作为名词的“道”,如果是由动词演变而来,则此动词最有可能是引导意义上的“道”。而作为“说”动词意义上的“道”则是后来引申的意义。

③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3 页。

高度概括;“德”是道的显现、展开,以及在人生、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具体的指导和应用。

道学与儒学合力,共同对汉民族的思想文化和民族性格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道家经书《道德经》又有着与长期位居正典地位的《论语》迥然不同的哲学取向和文辞特点。《道德经》篇幅短小,充满意义的迷宫,语言的急流和悖论式表达法使其成为两千年来索解不尽的智慧宝库。《道德经》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书,它是格言和注疏的集合,前后并无明显的逻辑顺序^①。这 81 章犹如一串圆润的珍珠项链:像珍珠一样,各自独立,集合在一起,其效果则更显美奂绝伦^②。

在老子看来,真正本体性的东西,是不可能用语言符号表达的,一旦我们用有限的符号来形容“道”,这个本体的无限意蕴便不可避免地遮蔽起来。老子的语言局限论,经过庄子和禅宗的继承发挥、历代智者的感悟共鸣,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鲜明的主题,成为影响人们不重视语言和言语表达的文化暗流。但也正是由于老子学说的遮蔽性和歧义性,才成就了《道德经》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注家最多”的奇迹。

元朝大德乙巳年(公元 1305 年),天师张与材在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序》中说:“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③“三千”一数,已难考证,但足以见注家之多、解说之不一和意义之难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丁巍副研究员及其同事历经 14 年的普查访求、考校修订,搜集整理了二千五百年来中外老学典籍文献。丁巍等指出,仅汉语言体系的老学典籍

① 虽有学者认为,《道德经》文本传达着非常松散的概念,缺乏内部逻辑性;事实上,《道德经》文本具有内在题目的一致性和思想表述的整体逻辑性,是中国逻辑思维重归纳、尚整体的典型代表。

② Kwok, Man-Ho. et al. *Tao Te Ching*. Dorset: Element Books Limited, 1993. p. 10.

③ 参见(元)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12 册第 725 页。

就有 2 048 种。加之历史上见于著录的注本在宋代已十有八、九散失^①，而未曾著录却早已亡佚的又不知有多少。由此可知，“三千”应当是很保守的统计数字。

一般认为，史上对《道德经》的注疏可追溯至战国时法家学派的韩非子，其《解老》、《喻老》是迄今最古老的解释老子思想的著作。其实，继老子之后道家学说集大成者庄子，在其著作“寓言十九”中，已经开始大量引用《道德经》的原文加以发挥，形象通俗地阐发老子的思想^②。

韩非子《解老》表现出明显的个人偏好：重视下篇有关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部分，不重视上篇关于形而上思维的部分。这与法家的学术旨趣（重功效）是分不开的。文中虽有许多鞭辟入里的解释，但也有明显的曲解和误解^③。处战国之际的法家，力主通过变法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因而韩非就从《道德经》中寻找证据，说“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认为老子是“重变法”的，王力指出，此说“颇违老聃之旨”。《喻老》更多误说，用历史故事去附会、曲解老子学说，“粗浅而失玄旨”^④。汉代以降，道家、道教、儒家各派争相诠释《道德经》，甚至佛教徒也跻身《道德经》注疏家行列。时间的距离和语言本身的特点给人们带来理解的难度与翻译的障碍。历代诠释者对《道德经》的诠释、注疏既受注疏者个人知识经验、思维方式的影响，也受他所处

① 参见丁巍主持的课题《老子典籍考：二千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总目》。该课题于 1991 年作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老子研究》子课题立项，1997 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2004 年 7 月以优秀等级结项。网络信息来源：<http://www.hnass.com.cn/rwzf/dw.htm>。另参见尹志华，《北宋〈老子〉注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4 年。

②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有对庄子的评价：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也说，庄子“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

③ 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52—356 页。

④ 王力对于韩非《解老》、《喻老》篇的评价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53—354 页。